

布衣文丛

生命册上

主 编 邓九平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半无人私语时:婚姻篇/麻文琦,杨云峰编-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6

(七彩人生散文丛书·四)

ISBN 7-80088-564-X

I. 夜… II. ①麻…②杨… III. 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0617 号

七彩人生散文丛书·四

夜半无人私语时

婚姻篇

麻文琦 杨云峰编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黄城根南街 9 号 邮政编码 100032

三河市华东印刷厂激光照排

三河市华东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7.75 字数 170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0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8001—13000 册 定价 8.00 元

ISBN 7-80088-564-X/I·46

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粒灰也还是爱国的。

季羨林

我提出了民族精神的问题，认为中国文化的内在的基本精神主要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张岱年

《布衣文丛》顾问

钟敬文	教授
张岱年	教授
严文井	先生
冯亦代	先生
卞之琳	先生

《布衣文丛》编委会

牛 汉	碧 野	汪曾祺	邵燕祥
林斤澜	舒 乙	邓九平	任洪渊
周传云	于海婴	斯 妤	张树英

平心静气

——《布衣文丛》代序

汪曾祺

把这样一些看似彼此没有多大关联的文章放在一起，编成一套书，有什么意义？意义还是有的。这些文章虽然散散漫漫，但有一种内在联系贯通的东西，那就是都是谈人生的，对人生的态度和感受。或多或少，都有一点人道主义的精神。

宋儒提出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不通人情，悖乎人性的酷论，因此为后世所诟病，但宋儒亦有可取的一面。我很欣赏这样的境界：

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时佳兴与人同。

用一种超功利的眼睛看世界，则凡事皆悠然，而看此世界的人也就得到一种愉快，物我同春，了无粘滞，其精要处乃在一“静”字。道家重“习静”，“山中习静朝观槿”，能静，则虽只活一早上的槿花，亦有无穷生意矣。“与人同”，尤其说得好，善与人乐，匪止独乐，只真得佳兴。

宋人又有诗：

顿觉眼前生意满，

须知世上苦人多。

这说得更为明白。“生意满”即“四时佳兴”，“苦人多”说出对众生的悲悯关怀，此蔼然能仁者之心也。

这样的对生活的态度是多情的，美的。

人之一生感情最深的，莫过于家乡、父母和童年。离开家乡很远了，但家乡的蟋蟀之声尚犹在耳。“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不论走到天涯海角，故乡总是忘不了的。“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这是一种东方式的思想，西方人是不大重视的，但是这种思想是好的。“瓶花妥帖炉香稳，觅我童心四十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人到上了岁数了，最可贵的是能保持新鲜活泼的、碧绿的童心。此书所收的文章，写家乡、父母、童年的比较多，这是很自然的。

人生多苦难。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生经忧患，接连不断的运动，真是把人“整惨了”。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却能把一切都忍受下来，在说起挨整的经过时并不是椎胸顿足，涕泗横流，倒常用一种调侃诙谐的态度对待之，说得挺“逗”，好像这是什么有趣的事。这种幽默出自于痛苦。唯痛苦乃能产生真幽默。唯有幽默，才能对万事平心静气。平心静气，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也是优点。

现在处在市场经济时期，像一般资本主义初期积累时期一样，不免会物欲横流，心情浮躁，重利轻义，道德伦理会遭到一场大破坏。在这样的時候，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委托邓九平同志主编这套《布衣文丛》，有何意义，对青年读者会产生什么影响？影响是有的，唤醒青年的良知，使他们用一种更纯真，更美的态度对待生活。“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青年人干涸的心里洒一片春雨。

是为序。

1996年11月

目 录

1	胡曲园	心以积疑而起(节录)
11	楼适夷	零零碎碎的记忆
30	李广田	回声
36		绿
38	李健吾	说一叶知秋
41	张天翼	我的幼年生活
48	谢冰莹	生日
52	邓广铭	我和北大
56	吴大猷	我的学术道路
59	陆 蠡	囚绿记
63		光阴
68	周立波	黄河
72	徐 汙	夜
75	吴组缃	谈梦

80	叶永蓁	浮生
90	张中行	红楼点滴
100		寿则多辱
106	张岱年	志在阐扬真理
119	萧 乾	感情的历程
128	林 放	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132	艾 青	我曾经喜欢
136	卞之琳	漏室鸣
140	钱钟书	谈交友
149		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155	徐懋庸	草巷随笔
161	谭其骧	一草一木总关情
170	杨 绛	干校六记·冒险记幸
179	吴富恒	世纪末的回顾

192	季羨林	幽径悲剧
197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204	金克木	遗憾
207		老来乐
209	唐 弢	生命册上
231	荒 煤	梦之歌
239	冯亦代	向日葵
242		辞听风楼
245	孙 犁	芸斋琐谈
258	子 冈	人之初
261	方 敬	圣洁的门
265	徐 迟	理想树

胡曲园 (1905—)

湖北江陵人。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学者。著有《形式逻辑》、《公孙龙子疏论》(合著)、《跋涉》等书。

《心以积疑而起悟》(节录)

—

我与中国二十世纪有缘,可从本世纪初说起。1905年9月16日,我出生于湖北省江陵县胡家台村。我父亲给我取名叫胡庭芳,三十年代我在上海发表文章曾用笔名“天放”,是“庭芳”的谐音。因为我家居处的地名又叫曲水村,所以后来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在北京给我治印时特起“曲园”为别名。

我的父亲胡荣圭,以务农为生,曾参加反清秘密组织“哥老会”。父亲得病去世时,我才四岁,家境十分艰难。我的母亲田唯玉,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家中主要依靠母亲、祖母耕种几亩薄地维持生计。祖母对人慈善,乡邻称她“四婆”,哪怕自己再穷也要省下几口饭来给过路乞丐。艰难的童年生活中,有两件

生命册上 1

事在我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痕。

那年头，因家中缺乏男劳力，祖母只得和远房本家合买一头牛耕地。可是，这种依傍血缘宗法关系的“公有”财产，毕竟抵御不住外侮内患，加之饥荒、苛税的侵吞，不久，因为无力偿还欠债，这头合买的牛便眼睁睁地被债主牵走了。这下弄得几房本家亲戚天天跑来吵闹。

江陵一带多水患，按治水社会不成文的公约，每家每户每年都要出人去修堤筑堰。胡家台村河沟纵横，更是摊工不断。有一年，我家因为没有男劳力顶差修堤，又拿不出钱请人替工，惹怒了村里几条壮汉，这几个人竟抬来一棵大树桩，将我家的大门砸倒了。吓得全家人躲在屋子的一角，连气也不敢透一下，那时担惊受怕最多的是我母亲，一家老小的生活重担也压在她一人肩上。每当悲苦难言之时，母亲就领着我来到父亲的坟前痛哭，每一次我总是凄然地望着母亲颤动的身子而泪流不止。就这样，我小时候脑袋里总是转着这样的念头：为什么总是穷苦人受欺侮，什么时候人世间才会有公平？苦难的童年，磨练了我爱憎分明、倔强抗争的性格。

我的童年生活的转机，完全是由我的叔叔胡鄂公带来的。胡鄂公，字新三，号南湖，1906年离家出走，投身反清运动，加入同盟会铁血团、振武社，后又加入共和党，被选为国会议员。后来曾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创办《今日》、《反帝国主义运动》等杂志，与共产党人李大钊交往甚密，曾为营救李大钊而竭尽全力。1917年，我和全家随叔叔迁居北京，我考入了当时北京很有名气的正志中学读书。正志中学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将徐树铮模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学制创办的，实行军事国民教育。该校的教务长是古文大师林琴南，桐城派古文大家姚鼐的后代姚永概是副教务长。所以，这所学校无论是在思

想控制还是学业要求上都很严格。

那年六七月间，恰遇“辩帅”张勋导演了一场复辟丑剧。几天之内，北京城内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我又随家逃难，全家到天津暂住。政局的动荡，官场的黑暗，使我开始明白造成天下哀鸿遍野的症结所在，朦朦胧胧地觉察到国家政治的腐败。正在酝酿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吹来一阵阵思想启蒙的清新之风，使我受了启蒙和熏陶，渐渐立下了献身于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志向。

听前辈人说，在辛亥革命前后，最流行的一本书是《天演论》。当时在封建愚昧的气氛笼罩下，《天演论》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发现世界是进化的，都感到非常新奇。在五四运动期间，据我所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最流行的一本书，当时影响很大。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最早使用白话文体的一部学术著作，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商务印书馆正出版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茶花女》等，有名一时。当蔡元培为胡适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序》，并将该书介绍给商务印书馆时，商务印书馆感到用白话来阐述古代典籍，有些不伦不类，但又碍于蔡元培的面子，就送了三十元的稿费把稿子搁下来了。胡适没有接受稿费，要求出版后再说。商务只好在1919年2月把书印了出来。哪知一经出版，便风行一时。

有一天我买到了一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从目录我知道书中讲的是古人古书，又是白话，我想这书一定可以有助于我的课堂学习。哪知看下去时，就不对了。胡适说：“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有许多后果。”我当时看了，暗自吃惊。我想我们的林教务长、姚教务长不都是口口声声说，圣人是天生的么？怎么又提出“决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问题呢？胡适

还说,“这个前因,所含不止一事。第一是那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第二是那时代的思想潮流”。“这两事又是互相为因果的。有时是先有那时势,才生出那思潮来;有了那种思潮,时势受了思想的影响,一定有大变动;所以时势生思潮,思潮又生时势,时势又生新思想。”我看了又惊又喜,心想我们全国闻名的林教务长、姚教务长从春秋左传到唐宋八大家讲了一大堆,怎么就没有说清孔子的学说是怎样产生的呢?难道孔子的思想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么?我怀疑了,我感到自己有些会用思想了,我非常高兴,我拿着胡适的书,问了这个同学,又问那个同学,说:“你知道学说是怎样产生的么?”同学们都说我发疯了。当日的情形,如今记忆犹新。这是我读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留下的第一个印象。

当时林琴南给我们讲“修身”课,说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姚永概给我们讲“我师录”,即圣贤嘉言钞,同样是说明在家要孝,做人要守礼。同学们都很年轻,头脑是一张白纸,由于他们的熏染,影响很深,因此同学之中常常出现孝子嘉行之类的事情。我的一个同班同学,他的父亲病了,经久不愈,他就仿效古人“割股”的办法,从自己腿上割了一块肉,烧汤给他父亲吃,他父亲把他的肉吃下去了,结果还是死了。这件事情在我们同学中引起很大刺激,不知怎样理解才好。胡适在他的《大纲》中指出:儒家“孝的人生哲学,要人尽孝道,要人做一个儿子”,而不是做一个人,“把个人埋在家庭伦理里面了”,成为“孝的宗教”的牺牲品。我想我接受了不少的封建伦理教育,但是我还不知道我是“孝的宗教”迷信的信奉者。我联系到同班同学的事迹以及我自己的在家庭中不合理的遭遇,我从封建伦理说教者接受的理论全都解体了,我不由得重复鲁迅的话喊道:“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以巴黎和会为导火线的五四运动爆发了,我所在的正志中

学也深深卷入了这场爱国民主运动的旋涡之中。然而,就在我们参加示威游行的前一天深夜,校长徐树铮突然匆匆来到学校,把已经入睡的学生全都集合起来训话。徐戎装冠带,脸色阴沉,声色俱厉,一直把学生们“训”到子夜过后。大部分师生沉着机智地应付,我们等徐走后不久,又聚集起来准时参加了游行。作为一名示威游行的活跃分子,我后来被学校开除了。通过这场面对面的斗争,我更加看清了军阀政府的反动本质,进一步坚定了救国救民的志向。

二

被正志中学开除之后,我又转入了北京第四中学。这所学校较为开明,校内有学生组织的自治会。我到校不久,很快就被推举为学生会干事。在四中读书期间,我有幸结识了一些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同乡,在与他们的接触和影响下,我于1924年考上了北大文学院德国文学系,想以文艺为武器,推动中国的社会改革和进步。

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新思想的摇篮,自蔡元培先生担任北大校长以来,大力倡导“兼容并包”的民主自由校风,培育了一代追求真理的青年知识分子。当时,著名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都相继到校任教,学校里的民主空气很浓,学术活动异常活跃,北大校园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当时的北大学生,除了学校规定的专修课和必修课外,还可以跨年级选修自己感兴趣的其他课程,甚至可以去听任何一位自己所喜爱的教授讲课,不同意老师的观点,可以当堂质疑争论,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在这一段时间,我选修过中国古诗词课程,任课教授刘毓盘给我印象极深。这位教授是个老古董,留

着小辫子，讲课声音极小，但听他讲课的人却很多。由于他在黑板上写的粉笔字很小，所以有些学生索性盘腿坐在讲台前的地板上听讲。我也听过鲁迅先生讲课，鲁迅先生幽默风趣、针砭时弊的话语常常引得学生们时而沉思，时而大笑。

北大校园里的民主空气浓厚，进步力量活跃，有不少师生们自发组织的学术团体及名目繁多的同乡会组织，还有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是湖北人，由人介绍参加了湖北同乡改进社，社中不少人都是共产党员，该社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外围组织。我在社中经常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影响，特别是在听了李大钊讲授的唯物史观课程后，逐渐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学习期间，我接触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便是由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决定改变自己的专业，由文学专业转向哲学专业。1927年，全国政治风云突变。该年4月，我所十分敬仰的北大教授、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惨遭军阀张作霖杀害，这一事件进一步激起了我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情与决心，同时也使我清醒地意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就在这一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我由一个普通的爱国青年变成了一名共产主义信仰而奋斗的战士。

当时，北京有一个叫“北方国民党左派大联盟”的革命组织，主持者是北大教育系主任高仁山，我担任这个组织的宣传干事。其时，北京正处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黑暗统治下，革命势力遭到近乎疯狂地镇压，进步力量受到令人发指的摧残。《向导》周报曾揭露说：“反动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军队占据了北京，北方民众革命运动概受摧残，革命的民众领袖概被通缉，左倾的进步的报馆被封，左倾的进步的新闻记者被枪毙。”（《向导》151期）“近且以扑灭赤化为名搜检各大学，凡校内进步的左倾的教职员，均视

为犯有赤化嫌疑，闻被列名通缉者至四百人之多。”（《向导》154期）1927年下半年，“北方国民党左派大联盟”遭到严重破坏，高仁山被杀害，我和另外两名干事李朴园、孙钰也被秘密通缉。同年年底，共产党北京市委决定发动武装暴动，并指定裴文中为总指挥，我参加了筹备工作。但是由于消息泄露，未及起义，就遭到破坏。这样，我在北京已不能安身了，于是在这年岁末，离开北京，由塘沽乘船，到日本避难。

在日本期间，我先在东京补日语，后到京都与几个留日学生组织了哲学讨论会，继续进行哲学理论研究。我与李亚农、史殿昭（即史存直）等人一起，阅读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家河上肇、永田广志等人的著作，从而开阔了研究的视野，为日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问题积累了经验。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爆发，军阀张作霖被炸死，我这才由日本返回国内，继续在北京大学就读，并且依然从事学生运动，担任地下党组织的党小组长。1930年4月，北京地下党组织为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并抗议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决定组织一次游行示威。那天，一百多人聚集在米市大街天主教堂里秘密举行筹备会议。不料事情泄露，与会者刚一走出教堂，即被早已包围教堂的反动军警逮捕，投入监狱。我和未婚妻陈珪如一同被捕，被关了半年多，直至9月底才被释放。出狱后，我正赶上参加北大的毕业考试补考，从而完成了自己的求学历程。由于在北京无法继续活动，这年年底，我告别了生活学习了十多年的古都北京，偕同陈珪如一起来到上海工作。

短短的三四年斗争生活，使我政治上逐步成熟，学业上逐渐完善。这期间，我不仅更多地理解了中国革命的重大实际问题，而且为今后的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